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钧

# “第三类语言”面面观

吴南松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I046/17

译学新论丛


2008

柏然 许 钧

# “第三类语言” 画面观

—— 文学翻译中的译作语言探索

吴南松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类语言”面面观:文学翻译中的译作语言  
探索/吴南松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

(译学新论丛书)

ISBN 978-7-5327-4407-7

I. 第… II. 吴… III. 文学-翻译-语言学-研究  
IV.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6818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第三类语言”面面观

——文学翻译中的译作语言探索

吴南松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125,000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250册

ISBN 978-7-5327-4407-7/H·806

定价:15.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检科联系。T:021-56401196

## 总 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总  
序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与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70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

化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50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加

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1989年与1993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20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20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3位之外，其余17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20位代表人物被列入6大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5个流派都是近50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20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编

2007年8月18日于南京大学



人在语言中成长,在语言中相互开放,在语言中成为社会之网的网上纽结。惟其如此,翻译乃是透过另一种语言对人的生存状况的一种展示。语言不只是工具,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它不仅将我们的观念固定下来,而且将一代人的观念留传给子孙后代。因此,语言是文化的基因,是死人与活人对话的场所,它将现在、过去与未来联系成一体,使之成为滔滔不息的长河。

——汪家堂

目  
录  
Contents

<b>第一章</b>	<b>“第三类语言”概念的提出</b>	/ 1
	第一节 翻译中的译作语言问题	/ 4
	第二节 本书的意图	/ 30
<b>第二章</b>	<b>文学翻译中“第三类语言”存在的必要性</b>	/ 33
	第一节 文学翻译中的译者身份	/ 38
	第二节 文学翻译中的差异性问题的	/ 58
	第三节 文学翻译中的读者	/ 80
	第四节 “第三类语言”与译语社会文化之繁荣	/ 105
<b>第三章</b>	<b>文学翻译中“第三类语言”的普遍存在</b>	
	——以英汉文学翻译为例	/ 113
<b>第四章</b>	<b>“第三类语言”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b>	/ 133
	第一节 “第三类语言”的主要特征	/ 135
	第二节 影响“第三类语言”的因素	/ 145
	第三节 “和而不同”原则的提出	/ 159
	<b>结语:走向“第三类语言”</b>	/ 168
	<b>后记</b>	/ 172

## 第一章

# “第三类语言”概念的提出



“第三类语言”常常被用来指代计算机语言或者除了母语及第二外语之外的其他外语<sup>①</sup>，但是本书所要讨论的“第三类语言”却是指翻译中的译作语言。

提起“第三类”，也许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第三类接触”。曾任美国空军部《蓝皮书计划》顾问达二十年之久的天文学家海内克博士，把有关与不明飞行物近距离接触的报告分为三类：第一类接触指不明飞行物没有影响周围的事物；第二类接触指飞行物影响到周围的事物（如地面上留下燃烧的痕迹等）；第三类接触指看到该飞行物上的外星生物，包括与之直接接触的情况。

上述内容当然与本书主旨无关，然而细细想来，又似乎并非毫无联系。我们不妨把翻译比成是同不明飞行物的接触：这种接触有可能完全不影响到周围的事物，即翻译时完全归化，使得异域文化犹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sup>②</sup>；第二类接触虽然使异域文化留下了一些细微痕迹，但仍然是一种间接性接触，译作读者仍然是通过地道的译入语来认识外来文化；第三类接触则是一种直接性接触，译作读者通过一种新颖的、建基于译入语同时又携带许多异质性成分的语言亲身感受到了异域文化的存在。在这最后一类接触中，译者不再满足于使用规范化的语言来重新表达原作的意义和内容，而是力图通过对译入语的革新，来尽可能传达原作所体现出的语言文化差异性。显然，这种努力所产生出的译作语言必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源语和译语，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我们不妨称之为“第三类语言”。

① 如时下比较火热的第三类语言训练就是此意。

② 当然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种情况多数发生在改译、编译等不太严格的翻译形式中。

## 第一节

## 翻译中的译作语言问题

孙致礼教授在他的《新编英汉翻译教程》一书中指出：“概括起来，翻译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翻译的根本任务，用鲁迅的话说，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用茅盾的话说，是‘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用钱钟书的话说，是‘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二是完成这根本任务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用鲁迅的话说，是‘力求其易解’，用茅盾的话说，是‘纯粹的祖国语言’，用钱钟书的话说，是‘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sup>①</sup>质言之，前者是要解决译作同原作间的关系问题，后者则是要解决译作语言的选择问题，由此可见译作语言问题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

翻译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纵观中西方翻译史，无论传统译论还是现代译论，涉及译作语言问题的论述都相当多。在中国，早在东汉末年，支谦在其《法句经序》里就已提出了自己对译作语言的看法，即译文应当做到“易晓”和“不加文饰”，与此同时，他还引用了老子的名言“美言不信，信言不美”来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晚清时期，严复提出了中国译论史上著名的“信、达、雅”三原则，其中“达、雅”两字涉及的也是译作语言问题。严复之后，关于此问题的讨论更是越来越多，众多名家都纷纷提出自己的

<sup>①</sup> 孙致礼.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p9.

观点。例如,鲁迅早期的主张是译语应当“力求其易解”,到后来则转变为主张“宁信而不顺”;茅盾的提法是应当使用“纯粹的祖国语言”;在傅雷看来,理想的译文就应该像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而钱钟书则强调译文要“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此外,像张谷若提出的“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译文”说,以及许渊冲所主张的“发挥译语优势”论,它们都曾在中国译界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接下来再让我们看看西方的情况。西方关于译作语言问题的论述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当时著名学者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就曾指出,翻译家必须照顾译语读者的语言习惯,用符合译语规范的语言来打动读者或听众。此后,1789年,英国学者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率先提出了翻译三原则,其中最后一条原则就是译作应当“具有原创作品的特性,显得自然流畅(natural and easy)”。翌年,另一位更出名的英国学者泰特勒(Alexander F. Tytler)也提出了一个三原则,它同坎贝尔的三原则如出一辙,不过是说法稍有改变,其中对译作语言的要求是译作必须“忠实体现原创作品的通顺(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s)”。进入二十世纪后,翻译研究在西方得到了空前发展,涌现出了众多不同的理论流派,然而译作语言作为翻译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所引起的关注并未由此减少。例如,美国著名译论家、等效论提出者奈达(Eugene Nida)在他给翻译下的定义中使用了“最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语(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这一概念,这意味着他对译作语言的要求就是“自然”,就是尽可能符合译入语的表达规范和表达惯例。而作为解构主义译论代表人物之一的美国学者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则正好相反,主张译作语言应当尽可能不要流畅易懂,以反映原作中所体现出的差异性。

面对中西翻译史上如此众多的关于译作语言问题的论述,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对它们进行一番回顾与梳理,以便了解它们中的主要思潮,掌

握它们的发展历程,为对译作语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做准备。

### 一、中西译论的回顾

在回顾历史时,一个经常令人头痛的问题是如何对历史进行分期,对翻译史的回顾也不例外,这其中的原因自然是因为人类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很难用明确的时间段来对它进行切分。不过,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还是有必要进行一点这种尝试。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翻译史,不同的研究者都曾有过不同的分期方法:有的采用历史性的划分法,如斯坦纳(George Steiner)及谭载喜先生对西方翻译史的划分、陈福康及马祖毅先生对中国翻译史的划分都属于这种方法;有的则以翻译思潮及翻译流派甚至是重大的翻译活动为标志来划分,如纽马克(Peter Newmark)、奈达以及根茨勒(Edward Genzler)等人对西方翻译史的划分;还有的采用两种方法混合使用的划分法,如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其《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一书中使用的方法。

由于本书主要目的不在于研究历史,因此笔者不打算另辟蹊径,而是采用历史时期与重大翻译活动相结合的方法,将西方翻译史简单分成古罗马时期、《圣经》翻译时期、近代时期(文艺复兴后至二十世纪前)以及现当代时期(二十世纪以后)四个阶段,将中国翻译史分成佛经翻译时期、晚清时期(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之前)以及现当代时期(五四运动后至今)三个阶段来加以回顾。在回顾的过程中,我们将把着重点放在对译作语言问题的论述上。

#### (一) 西方译论

##### 1. 古罗马时期

埃里克·雅各布森(Eric Jacobson)曾宣称翻译是古罗马人的发明<sup>①</sup>,

<sup>①</sup> Bassnett, Susan.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 N. Y.: Routledge, 1991. p43.



这话虽然夸张,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出古罗马时期在西方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事实上,古罗马一些著名学者,如西塞罗、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等,他们关于翻译的论述一直对后世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所探讨过的一些关于翻译的重要范畴与概念,在其后的两千年来里也反复被不同的翻译理论家所讨论。纵观西方翻译史,尽管最早的译事活动并非出现在古罗马时期,但是最早对翻译进行有意识讨论的却是古罗马人,因此雅各布森说翻译是他们的发明,也并非毫无道理。

要把握古罗马人的翻译观,有三点至关重要。首先,古罗马的一些重要翻译理论家,如西塞罗、贺拉斯等,他们首先都是诗人,因此在他们看来,译者的任务与诗人的职能是相通的:一是传播新知,二是展示高超的艺术技巧。<sup>①</sup>换句话说,译文一方面要传达原作的內容,另一方面,翻译又不能是依样画葫芦,而应当是一种创作,不仅要能与原作媲美,而且如有可能,甚至还要在表达上超过原作。其次,在罗马人的观念中,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丰富本民族的文学系统。虽然罗马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但是罗马人心里清楚,希腊文学的确要比他们本民族的文学高出一筹。他们希望通过翻译来借鉴希腊文学的长处,而既然是借鉴,那就意味着译者的中心任务不是对原文的“忠实”,而是通过模仿原文,创造出属于罗马人自己的文学作品。第三,由于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古罗马人都会希腊语,而正是这些人构成了译作的读者群,因此这里的情况就和正常情况不同:读者不是要通过译作去了解原作,而是通过原文来审视译文,审视译者的创作能力和语言使用技巧。这样一来,评判一位译者能力的高下,就不再是看他能否忠实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及语言风格等等,而是看他能

① Bassnett, Susan.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 N. Y.: Routledge, 1991. p43.